

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 合理比例的客观标志

王 善 迈

教育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但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才算合理?判断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合理比例的客观标志是什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本文试图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一、决定教育投资的客观因素

教育投资是投入到教育领域中、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智力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从投资对象来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投资,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投资,用以培养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二是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的投资,用以提高现有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智力水平。前者是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后者是教育投资的次要部分,但后者的绝对量及其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和技能更新的周期缩短,从而需要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不断进行再教育和再训练所决定的。从投资来源说,则包括国家财政、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用于教育的一切支出。其中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主要部分。本文考察的对象,只限于国家财政用于学校教育的投资,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教育投资的多少,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应占有多大比重,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最终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既决定着教育投资的需要量,也决定着教育投资的可能量。

决定教育投资需要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状况、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由于教育劳动的对象和成果是人不是物,教育投资是用于培养和提高劳动力的投资,因而教育投资的需要量首先取决于人口。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在各级各类学校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不变动的条件下,现有人口和增长速度,从而受教育者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同所需教育投资量和增长速度成正比。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文化程度

构成,决定着适龄学校教育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构成,从而也影响着教育投资的需要量。一般地说,人口年龄构成轻,青少年在人口中比重大,则适龄教育人口多。人口文化程度构成低,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程度构成低,则劳动年龄人口中,文化普及和提高的任务较重。为此,教育投资、尤其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资需要量也较多。人口的分布和密度影响着教育单位(学校)的规模,影响着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一般地说,人口分布较平衡,人口密度较大,教育单位规模适度,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较少;反之则较多。

就我国来说,人口对教育和教育投资的影响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基数大,在较长时间内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决定了受教育者数量大,所需教育投资量多。第二,人口年龄构成轻、文化程度构成低,决定了我国适龄教育人口数量大,在学校教育金字塔结构中,金字塔的基础部分,即初等和中等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需教育投资量、尤其普通教育投资量相当大。据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1982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33.6%。(《统计》1984年第1期)在总人口中,大学毕业、肄业、在校生共占0.6%,高中文化人口占6.6%,初中文化人口占17.8%,小学文化人口占35.4%,12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3%强。同年各级学校在校生总数达18,790.2万人,其中小学生占学生总数74.4%,中学生占25%,大学生只占0.6%。(《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三,人口分布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极不平衡,这使我国农村和西北、西南等地区受影响者人均教育费用较多。我国要在1990年普及小学教育,虽然所剩任务不多,但都十分艰巨。因为普及任务集中在“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地区)、山(山区)、边(边疆地区)、穷(贫困地区)”地区,所需教育投资量相对来说是较多的。

科学技术是决定教育投资需要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教育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的生产(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再生产(科学技术成果的掌握)有赖于教育的发展,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发展对教育投资需要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影响着教育的程度结构(各级学校的结构),从而影响着教育投资的需要量。一般地说,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越高,对从事科学技术生产的劳动者(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等)的智力水平要求越高、数量也越多,对从事科学技术再生产的劳动者(教师和学生,这里撇开教师的科学研究)的智力水平要求也越高。这就使教育程度结构中,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比重提高,教育投资量增多。第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影响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物质技术条件。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新的学科不断出现,原有学科知识不断更新,学科间的互相渗透不断加深,教学物质技术条件,尤其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和现代化。为此,所需教育投资量也在不断增长。

我国人口文化程度构成低,学校教育中高等教育比重很小,科学技术水平十分落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劳动者数量少,质量不高。198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在全国人口中平均每万人口只有62人,在职工中平均每万名只有725.8人。(《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这一数字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

技术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需要大批的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材，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因此，需要不断增加教育投资。

社会需要发展的规模、水平和速度是决定教育投资需要量的综合因素。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规模、速度决定着劳动力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即使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不变，教育投资也将随教育要培养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多而增长。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 and 经济中的广泛应用，社会经济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劳动者中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重不断提高，从而教育程度结构中越高级教育的比重也越大，专业技术教育在全部教育中所占比重也越大，教育投资量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改变和更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日益发展，科技和管理日益重要和社会化，这必然使教育的专业结构改变，使教育专业结构日益复杂，在专业教育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教育投资随教育专业结构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大、增长速度总的说是比较快的，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要求大力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科技和管理人员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这就要求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尽快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教育投资需要量不仅数量大，而且存在着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考察教育投资需要量时，我们暂时撇开了教育投资的合理分配和使用经济效果（或使用效率）的因素。教育投资使用的经济效果表现为相同教育质量条件下，各级各类学校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如果教育规模不变，受教育者数量不变，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的相对降低，意味着教育投资使用经济效果的提高，教育投资的节约。如果其它条件相同，对教育投资的需要量将会减少。

一国一定时期内教育投资的多少，不仅取决于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可能。决定教育投资可能量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教育投资最终来源于国民收入，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民收入量，尤其人均国民收入量。物质资料生产发展水平越高，国民收入总量、人均国民收入量越大，可能用于教育投资的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财政收支是国民收入及分配的一部分，本文考察的教育投资只是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资。因此，教育投资的可能量直接取决于财政可能用于教育的资金。

教育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教育投资过少，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过小，会因教育培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限制物质资料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教育毕竟是非物质生产部门，教育投资过多，在国民收入和

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过大，超越了国力的可能，同样也会制约物质资料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我国物质资料生产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民收入很少，财政资金有限，能够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不可能很多。教育投资的需要量和可能量的矛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我们只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增长率所决定的受教育者的数量、质量、结构，和我国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兼顾需要和可能，确定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

二、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指标

为了确定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需要选择能够正确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指标。这些指标应具有整体性或全局性，应能在整体上、全局上反映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的关系。指标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具有可比性，既可以在国家间进行国际比较，也可以在一国的不同时期进行比较，以便在确定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时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总结自己历史的经验。指标应简明，具有实用性。

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指标有：

1. 教育投资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教育事业费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
2. 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教育事业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3. 财政支出的教育投资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财政支出的教育事业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
4.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

以上均是静态指标，它反映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的关系。为反映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还需要有动态指标，即二者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如国民收入、财政支出每增长百分之几，教育投资应增长百分之几。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年鉴中，把各国的教育支出分为经常支出和资本支出，这大体上相当于我国的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该组织把各国的教育支出总额同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总支出（相当于我国的财政支出）相比，把教育经常支出同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经常支出相比，得出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出的比重，以反映教育、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进行国际比较，可将我国的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换算为国民生产总值。当然由于这些指标各国的计算口径不尽相同，比较只能是大体上的。要进行国际比较，应选择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历史时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应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上述各项指标在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其中基本指标是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这是因为:

第一,教育投资最终来源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尤其人均国民收入量和增长速度,是反映一国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基本指标,也是决定教育投资量的比例的基本指标。

第二,社会总产值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它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的动态考察中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社会总产值中有一部分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不能用于教育投资,因此,在反映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上受到一定限制。

第三,财政收支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资是教育总投资中的主要部分,本文考察的教育投资只限于这一部分。因此,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作为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重要指标。但因为财政资金是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中的一部分,是派生收入,而且财政收支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受财政体制及其变动的影 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难以比较。因此,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能确切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使用这一指标时,教育投资应限于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时,应排除财政体制及其变动的影 响。

第四,教育事业费是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大体上可以反映教育发展规模,我国同外国一般较稳定。因此,教育事业费在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第五,基本建设投资是用于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它为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提供劳动手段,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物质条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是基本建设总投资中非生产性基建投资的一部分,它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如果基本建设投资分配比例不变,教育基本建设和全部基本建设至少应同步增长。否则,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就会因此受到限制,适应不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这一指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合理比例的客观标志

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以及教育本身处在发展变化中,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绝对合理的教育投资比例?那么,怎样检验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合理与否呢?或者说,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合理比例的客观标志是什么呢?

第一,从近期看,教育投资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否相适应。

教育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教育投资同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是否相适应,可以用来检验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合理与否。

使用这一检验标志的前提条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必须是适度的。它必须以一定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 和经济发展为教育事业发展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依据。只有在此前提下, 教育投资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否相适应才能成为检验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的标志。

这一标志具体表现在一定时期内, 全部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费用和各级各类教育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的变动上。合理的教育投资比例至少使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不低于前一个时期已达到的水平。如果低于前一个时期, 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维持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规模和速度, 使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下降, 从而使教育质量下降; 二是为保证教育质量, 保持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不变, 就必须调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缩小教育事业规模、放慢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这两种情况最终都会因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质量不高或数量不足, 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表明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不适当的。

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存在着上升的趋势, 这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所决定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要求教育的物质技术条件不断改善, 教育者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工作条件随经济的发展也要逐步提高, 等等。即使物价不变, 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也在逐步上升。因此, 合理的教育投资比例, 应保证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高于前一个时期。

在受教育者人均教育费用逐步提高的条件下, 教育投资超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过多, 将使教育投资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 降低其使用效果, 并因挤占其它投资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同样表明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不适当的。

第二, 从远期看, 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相适应。

教育投资是用于培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投资, 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合理与否, 最终表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和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结构上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否相适应。教育投资合理比例的最低界限, 是教育投资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最低需要量, 如果教育投资比例在此界限以下, 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因合格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不足而受到限制。只要经济发展为教育能够提供更多的资金, 教育投资比例应在此界限以上。如果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过剩, 同样表明教育投资比例是不合理的。

由于教育过程——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 因而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在当年或近期内表现不出来, 而只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表现出来。或者说, 当前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否适应, 是前一个时期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的结果。

采用这一标志检验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 应以各种熟练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和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科学地预测和规划目标为依据。我国过去没有或没有较完整的这种规划, 在评价过去和当前教育投资比例时。借鉴外国的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具体办法是, 可选择同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历史时期, 以人口和就业

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专门人才在人口和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主要内容进行比较。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专门人才的比重,是由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生产和教育发展史表明:在手工生产时代,文盲或具有较低文化的劳动者就可以适应生产的要求;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要求劳动者具备初等文化水平;到了电气化、自动化时代,劳动者必须具备中等文化水平;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则要求劳动者具有高中或更高的文化水平。中等以上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人才也是如此。在机器大工业初期,他们只是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刚刚从直接生产者分化出来;而后在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中的比重逐步上升;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在全社会和就业人口中,专门人才的比重大大提高。

第三,国民经济比例、尤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否协调。

教育投资比例实质上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教育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一部分,二者是国民经济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整体比例决定局部比例,局部比例反过来也影响整体比例。因此,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协调上可以得到综合表现。一般地说,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协调,教育投资比例较合理;反之,教育投资比例也不会合理。

国民经济比例中,对教育投资比例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教育事业费是消费基金的一部分,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因此,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积累基金内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投资量和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协调与否,是我们判断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下,积累率过高,生产性积累比重过大,教育投资会绝对地或相对地减少;而积累率过低,近期教育投资会绝对地或相对地增加,但因积累率过低,延缓经济的发展,最终又会使教育投资相对减少,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教育与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投资能否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是否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国民经济比例,主要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否协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可以作为检验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志。如能找出更正确、更明确的检验标志,则是本文预期的目的。